

共在的深渊：当代基督教婚姻中“执行性信仰”的生成与破裂

当代基督教婚姻正面临一种无法为既有诊断所捕获的危机。本文拒绝将这种危机归因于“世俗化侵蚀”或“功能外包解体”，而是追踪它在一个被整个系统默认为真的底层先验中被发生出来的具体路径。

那个先验是：在终极苦难面前，存在一套“正确的应对方式”，伴侣的责任是帮助对方执行它。

作者 胡敏 · 约 1.9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基督教婚姻正面临一种无法为既有诊断所捕获的危机。本文拒绝将这种危机归因于“世俗化侵蚀”或“功能外包解体”，而是追踪它在一个被整个系统默认为真的底层先验中被发生出来的具体路径。那个先验是：在终极苦难面前，存在一套“正确的应对方式”，伴侣的责任是帮助对方执行它。从这个先验中生长出一整套被本文命名为“执行性信仰”的灵性-管理技术——它通过标准答案的预植入、双人复核的常态化、以及深渊体验的预排除这三重机制，将夫妻的属灵关系从“共同面对不可知”重塑为“互相监督绩效完成”。然而，这套系统在其自身的极致高效中暴露出一道致命的裂口：当苦难的烈度越过标准答案的解释力边界时，夫妻双方发现自己被同一套话语武装到了牙齿，却丧失了任何一种在话语失效处彼此承托的能力。本文将这道裂口命名为“共在的深渊”——一种在意义框架坍塌时，以自身同样被破碎的生命经验为基底，悬置一切修复冲动、不携带任何神学结论、仅仅以在场的沉默承托对方的伦理能力。通过两个具有民族志厚度的案例，本文展示“共在的深渊”如何从执行性信仰的裂缝中被逼出，又如何始终面临被重新收编为一种新型属灵操练的危险。文章的最终判断是：婚姻的韧性，不取决于双方执行同一套信仰话语的默契程度，而取决于他们在对方坠入语言无法抵达的黑暗时，能否克制住递上标准答案的冲动，仅仅以自身的破碎之躯，作为对方追问的沉默见证。

关键词：共在的深渊；执行性信仰；基督教婚姻；终极承托；沉默

一、引言：钝化的界线与未竟的追问

在当代基督教社群的婚恋话语中，“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1]被征引至近乎磨损。它划定了择偶的第一道门槛，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这道防线在实际运作中正变得令人困惑地“钝化”：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信徒无法清晰地指认自己“在主里”究竟意味着怎样一种实质性的生命状态时，以“信徒”这个身份标签去丈量另一个人，便难免沦为一种标签对标签的核对仪式——你有这个标识，我也有，所以我们理论上是“相配”的。至于那个标识覆盖之下的、各自在信仰中真实经验到的黑暗、怀疑与虚空，在这场核对仪式中从未被提上桌面。

对于这种钝化，已有的批判大致指向两个方向。

第一种将危机归咎于世俗化的侵蚀。在这种叙事中，婚姻之所以失重，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神圣的盟约，将婚姻降格为一纸世俗合同。这个判断携带着一种道德力道，但它的解释力在经验面前频频打滑：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使用“盟约”“遮盖”“属灵遮盖”等传统语汇的年轻信徒，他们的婚姻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空心化——话语密度极高，承托力极低。他们的婚姻不是被世俗话语掏空的，而是被宗教话语本身以一种未被识别的方式挖空的。

第二种诊断聚焦于功能外包。它的判断是：外卖、金融、心理咨询、数字娱乐正在将婚姻的诸多功能逐一拆解——经济协作、情感亲密、日常照护、社会身份——两头牛并排站着，身后的犁却已被一样一样地卸走。轭还在脖子上，却已没有什么真实的重物需要合力去拉。这个功能主义的视角捕捉到了一种真实的结构性位移，但它无法解释另一个现象：在许多共享全部生活功能的婚姻中——夫妻一同经营生意、一同服侍教会、一同养育众多子女——那种“我们其实从未真正进入过彼此的深渊”的虚空感，反倒更为刺目。他们拉的车很重，但那辆车碾过的路上，两个人的孤独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交汇。

这两种诊断都捕捉到了部分真相，却都停在一道更深的裂缝之前。

本文试图论证，当代基督教婚姻最根本的危机，不在这道裂缝的任何一侧——不是世俗化挖走了信仰的内容，不是功能外包卸走了轭的重量——而在于这道裂缝本身正在被整个系统以一种极其高效的方式遮蔽。它所遮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婚姻的真正承托力，并不来自双方对信仰话语的执行默契，而来自双方在各自生命出现断裂时，能共同进入那片“答案缺席”的幽暗地带，并在彼此的深渊边上完成一种单纯的、不携带任何解决方案的“共在”。

本文的任务，不是去讨伐那些遮蔽了这道裂缝的技术——婚前辅导的SOP、属灵清单的KPI、双人灵修的标准化教材——把它们统统打成“病灶”。那是一种停留在发现学表面的诊断动作。本文的任务，是追踪这些技术如何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度张力与神学预设中被发生出来，在何种条件下被稳定为一套高效运转的系统，又在何种临界点上暴露出它的结构性过载——并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让那个被整座系统遮蔽、却始终无法被任何一种现有概念所覆盖的核心辨别面自然显现。

本文将那个核心辨别面命名为：共在的深渊。

二、那个不被讨论的先验：从何处开始发生？

要理解当前这套婚姻牧养技术系统为何如此运作，必须首先追问一个它自身从不追问的问题：它建立在什么从未被主题化的预设立场上？

这个预设立场，不是某位神学家在某部著作中的论断。它毋需被任何人明确主张，因为它已经以一种“当然如此”的方式，沉积在整个基督教婚姻辅导的实践语法之中。本文将它从沉默的实践语法中提取出来，表述如下：

在面对婚姻中的困顿、虚无与危机时，存在一套“正确的应对方式”，且这套方式可以被夫妻双方共同学习、互相督促并协力完成。

这听上去几乎不容置疑。面对危机时，“怎么做”这个问题本身难道不是完全合理的吗？夫妻难道不应该一同寻求上帝的旨意、一同依靠圣经的话语、一同在祷告中交托吗？

正是在这个“几乎不容置疑”的地方，本文所要撤销的底层先验悄然运作。这个先验是：在终极的苦难与存在性的深渊面前，有一个“应该”去往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姿势，有一套可以被命名为“神的旨意”的解决方案。因此，伴侣的责任，是帮助对方朝那个方向、以那个姿势、拿到那个方案。

这个先验假设一旦被说出，它的暴虐性便显露无遗。因为它从根本上排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有些深渊，没有答案、没有方向、没有解决方案。当一个人坠入其中时，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站在岸边朝他喊“朝这边游”的向导，而是一个愿意跳下来，陪他一同被黑暗淹没的共在者——不是帮助他出去，而是留在那里，和他在一起。

但本文的任务不止于撤销这个先验。撤销一个先验，仍然只是在思想的层面做了一次清理工作。更根本的追问是：这个先验自身是如何在具体的教会历史、牧养实践与制度耦合中被发生出来的？它凭什么能在半个多世纪里，稳坐整个福音派婚姻辅导体系的基石之位？

本文的判断是：它之所以能稳坐那个位置，不是因为它被神学家论证得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好用——它在操作层面提供了每一个焦虑的牧师、每一种资源匮乏的教会事工都极度渴求的东西：可复制性、可互查性、即时可验证的效果。正是这种“好用”，使它在全球教会增长运动、家庭价值政治化、以及心理咨询话语入侵的三重合力之下，被一步步强化为今天的统治性语法。接下来的三节，将逐一追踪这三重力量如何将那个先验从一种默会的牧养直觉，锻造成一整套精密的灵性管理技术。

三、执行性信仰的生成：一个制度发生的追踪

这套技术，本文将在追踪完它的生成史之后，于第四节正式赋予它一个分析性命名：执行性信仰。但在命名之前，必须先展示它从何而来。这是发生学与发现学的根本分野：不是先造好一个“病”的名字，然后到田野中给它分配症状，而是从具体的历史土壤与制度张力中，追踪一个结构是如何被逼出来的。

3.1 焦虑的双重源头

它的第一个根，扎在20世纪中期福音派的一场深层焦虑之中。

二战之后，美国福音派面临着一种双重压力[2]。对外，世俗化进程加速推进，基督教在公共领域的道德权威不断流失。彼时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不是无神论者的人数增长，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大量持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比非信徒的婚姻更加稳固。离婚率的数据，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令人安心的防火墙。这使得“信仰改变生命”这个最核心的宣教口号，在经验层面遭遇了持续的证伪风险。

对内，敬虔主义的传统——那种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内在的、情感性的联结的灵性模式——在其长期运作中暴露出了它自己的难题：它难以被“互查”。一个信徒声称自己“与主亲近”，这个声称如何被另一个人验证？在讲台、小组和婚前辅导的场景中，认信的真实性需要被转化为某种可见的证据，否则整个互查体系就失去了操作的基础。

这两个焦虑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教会需要一整套可量化、可复制、可互查的属灵技术，来同时满足两个迫切的需求——对外，它可以提供“信仰确实改变了婚姻”的数据证据；对内，它可以让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位牧者，都能够随时核验“我们的属灵状况是否正常”。

3.2 教会增长运动与管理技术的合流

这个需求的条件，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教会增长运动中得到了系统性的满足。

源自20世纪中叶宣教学领域的这场运动，在其扩散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当时企业管理学的工具箱。目标设定、可衡量指标、定期评估、标准化操作流程——这些来自企业界的理性化管理技术，被逐一转译为教会的增长策略。“家庭祭坛”的频率、“每日灵修”的时长、“参与服侍”的出勤率，便是在这个转译过程中，从一种推荐的敬虔习惯，被逐步升格为可统计的、可评估的、进而被纳入教会年报表的属灵绩效指标。

这场转译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间铺展到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关键在于它同时满足了教会体制和信徒个人的双重需要。对于教会体制而言，这些可量化的指标解决了一个棘手的治理难题：如何在一间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大型教会中，对每一对夫妻的“属灵健康”进行可操作的评估与干预。对于信徒个人而言，这些可完成的清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功能：一份被勾选完成的每日属灵清单

，为信徒在那个古老的焦虑——“我真的得救了吗？”——面前，提供了一道可即时触碰的、可视化的安全感护墙。

正是在这种制度需求与个体心理需求的双向锁定中，“操作那些信仰话语的能力”便逐渐在实践层面被接受为“持有那信仰”的有效等价物。本文随后将命名的“执行性信仰”，其雏形正是从这个等价置换中生长出来的。

3.3 婚前辅导：标准化的落地

这个等价置换最清晰、最具分析价值的落地场景，是1970年代后在福音派教会中逐步制度化、标准化的婚前辅导课程。

这些课程的具体内容与宗派传统各异，但共享一个基本的运作逻辑：它们为准夫妻提供一整套“在婚姻中被验证过”的属灵工具——如何建立家庭祭坛，如何一起灵修，如何在冲突中“回到真理”沟通，如何在情绪低潮时用经文彼此劝慰。这套工具的系统性、步骤性和可操作性，是它获得大规模采纳的直接原因——它让牧师在短短几个周末就可以将一套完整的婚姻灵性生活框架“安装”进一对准夫妻的互动模式中。

然而，正是在这个高效“安装”的过程中，一个更具深远后果的位移悄然发生了。这些工具原本的意图——无论它的设计者初衷如何——是帮助信徒建立一种共同面对上帝的习惯。但在课程的具体实施和后续的共同体操练中，这套工具的实际运作逻辑逐渐偏离了那个初衷。因为它在评估层面所能检测到的，不是“你们是否真实地把各自的深渊带到了上帝面前”——那无法列在任何一个牧者的互查清单上——而是“你们是否按照标准程序完成了这些操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完成了这些操练”便在实践中有效地代理了“婚姻有属灵根基”的判断。

这便是那个本文将在后续各节中反复回到核心洞见：夫妻信仰实践的“可执行性”，在本应作为手段运作的地方，被系统性地升格为了目的本身。

3.4 心理咨询话语的嫁接及其限制

在这个生成史的末端，还必须处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变量：198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基督教辅导机构开始积极吸收现代心理咨询——尤其是家庭系统治疗、情绪聚焦疗法和依恋理论——的技术与话语。这常常被误认为是对纯粹“执行性”模式的一种纠正。毕竟，心理咨询至少在语言层面强调“倾听”“共情”“不轻易给建议”。

但本文在此需要划出一条关键的区分线。心理咨询的技术在嫁接进这套属灵绩效系统时，遭遇了一种结构性的收编：它的“倾听”和“共情”，在辅导课程的实际运作中，被转化为一种新的、需要被稳定执行的关系技能——同样可被分解为步骤、同样可被互查、同样在事实上被纳入“健康婚姻的属灵指标”清单。以当代教会婚姻辅导中最为通用的话语“积极倾听”为例，它往往被教授为一套标准化

的技术：复述对方的话、确认对方的情绪、不打断、不急于反驳。这当然比粗暴的“属灵遮盖”要精细得多，但它同样预设了同一个底层先验——在对方的痛苦面前，有一件“正确的事”要去做，而伴侣的责任就是去执行它。心理咨询的话语只是用一套更精致的“正确的事”替换了另一套更粗糙的“正确的事”，却并未触碰到那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做对的事”本身在某个临界点上失效时，伴侣之间还能剩下什么。

这正是为什么本文必须提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替代方案的核心命名。它不是在现有的工具箱里增加一把更精细的螺丝刀，而是要指出这整个工具箱在某一类极端情境中被共同验证的无能——并在这无能所暴露的裂缝处，指认一种此前未被命名的伦理能力。

那个能力的指认，尚需再推进一步。在命名它之前，必须先更清晰地测绘出当前这套系统在日常运转中的微观机制——它是如何通过标准答案的预植入、双人复核的常态化与深渊体验的预排除这三层结构，将夫妻之间的属灵联结从“共同面对不可知”重塑为“互相监督绩效完成”的。

四、执行性信仰的三重机制

前三节追踪了“执行性”——那种将信仰实践转化为可量化、可互查的绩效指标的倾向——如何从20世纪中后期福音派的双重焦虑、教会增长运动与技术转译、以及心理咨询话语的结构性的收编中被发生出来。从这一节开始，本文赋予这个被追踪出来的结构一个分析性命名：执行性信仰。它不是一张贴给某群人的病理标签，而是一个用于指认一整套弥漫的互动逻辑的分析工具——它嵌入在婚前辅导的课程设计里、沉淀在小组互查的话语习惯里、运作在每一句“我们祷告吧”的日常互动里。

本文将其运作机制分解为三重相互嵌套、逐层深化的结构。它们在日常婚姻的互动中是同时运作的，此处的分层解剖只是为了分析的需要。

4.1 第一重：标准答案的预植入

在婚前辅导的典型场景中，准夫妻被系统地输入一整套“婚姻属灵应激手册”。这套手册告诉他们在各种情境下应该怎么做：妻子感到被忽略时，丈夫应该学习“舍己的爱”去“遮盖”她的情感需要；丈夫面临失业时，妻子应该用“信心的话语”去“扶持”他的灵性；双方发生冲突时，应当遵循“不轻易发怒”的教导，回到“在真理中沟通”的标准程序。

需要在此立即做出一个限定，以免被误读。本文并无意图主张这些教导的内容本身是错误的——一个社群将自身积累的智慧结晶为指引，这是任何传统都会做的正当之事。本文要追究的，不是这些内容，而是这套手册在运作中悄无声息地完成的那个结构性的排他动作：当每一个能够被预见的情境，都配有一个“应当如此”的正确回应时，那些无法被预见、且从根本上无法被任何标准答案所覆盖的深渊性体验——约伯式的对上帝公义的嘶吼、传道者式的对一切意义皆虚空的判语、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那一声撕裂天地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便在系统层面被逐出

了可被正视的范围。

标准答案的暴力，不在于它提供答案，而在于它暗示了一个从未被说出的前提：一切真实的痛苦，最终都有一个答案。当以琳（本文将在第六节引入的第一对夫妻中的妻子）在康诺的嘶吼面前本能地启动“我们祷告吧”这个标准程序时，她不是在说谎。她真心相信这是正确的回应。但正是这个“正确”本身，成为了那堵横亘在她与康诺深渊之间的墙——它在最高效地给出答案的同时，也最高效地阻止她去真正听康诺在嘶吼什么。

4.2 第二重：双人复核的常态化

标准答案的预植入，解决的是“正确的回应是什么”。但仅有标准答案还不够——因为标准答案可能被遗忘、被偷懒、被执行时打折扣。因此，第二重机制是对执行状况的常态化复核。

在婚姻的日常互动中，这套复核机制并不表现为一份刻板的互查表格（尽管有些教会确实有），而是渗透在最日常、最灵性的互动形式之中：一起祷告、分享灵修亮光、在小组中交通婚姻近况。以琳和康诺的“我们一同祷告”这件事，从灵性的层面看，是夫妻二人同心来到上帝面前；从执行性信仰的系统运作逻辑看，却同时承担着一个复核功能——双方在灵性互动的过程中，无声地彼此确认：你还在路上吗？你的灵修质量仍然稳定吗？我们的绩效还在线吗？

日复一日，这种双人复核将信仰从一种个体独自面对上帝的内在姿态，双重化为一种伴侣共同面对的互相确证。需要特别注意：问题不在于两个人确实可以彼此扶持——那是任何健康的亲密关系都包含的要素。问题在于，在这种复核机制的长期运作中，双方确证的对象发生了决定性的位移：他们不再是在确证“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破碎的、无能的，此刻我们仍在一起向祂呼喊”，而是在确证“我们对这些属灵操练的执行，仍然符合标准”。上帝，从被彼此指向的那一位，变成了被彼此的绩效报告所代理的那一位。

4.3 第三重：深渊的预排除

第三重是最隐蔽，也最具摧毁性的。当前两重机制——标准答案的预植入与双人复核的常态化——无缝协作并长期运转之后，任何不能被标准答案所覆盖的深渊性体验，便遭遇了一种在系统层面被预先设置好的排除。

不是说这种体验无法发生——它当然会发生。任何真实活过的信仰生命，都必然在某处触碰到标准答案的边界。而是说，当它发生时，整个互动系统没有为它预备任何合法的表达接口。当康诺在数月的祷告无效之后终于嘶吼出“神到底在哪里”，从执行性信仰系统的逻辑来看，这不仅仅是一次痛苦的宣泄。这是一次“绩效异常”——一个原本稳定输出属灵清单的信徒，突然开始输出一套无法被任何现有标准答案正确响应的话语。系统的默认反应，因此不是去理解他在说什么，而是去纠正他的表达——通过加倍地祷告、加倍地宣告“神有美意”，将他重新拉回“正确话语”的轨道。

他并不是被禁止说出他的疑问。更糟的是：他说出来了，但系统听不见。它们将每一个“约伯式”的嘶吼都翻译成某种别的东西——翻译成“他在经历属灵攻击”，翻译成“他的信心需要被坚固”，翻译成“请为他代祷，他最近状态不好”。它们看不见那个嘶吼本身——那个嘶吼，正是他在此时唯一能够给上帝的、诚实的信仰行动。

三层机制叠加，便生产出了这样一种婚姻：夫妻双方高度默契地执行着全套属灵操练，话语密度极高，绩效清单完成得无懈可击，却从未在彼此的沉默中，凝视过对方那双藏着一整个深渊的眼。他们以为自己在“共负一轭”，实则只是在并肩完成一份永无止境的、被灵性外衣包裹着的属灵KPI报表。

五、那个从未被命名的：二阶碰撞与“共在的深渊”

对于一个旨在建立新概念的论证而言，走到这里仅仅是完成了清理地基的工作。接下来的这一步，是整篇论文最关键也最脆弱的一步：必须正面回答，那个被整个系统遮蔽、但无法被任何既有概念所覆盖的辨别面，究竟是什么。

5.1 与最近邻的对质：为何既有的命名无法覆盖？

一个诚实的命名，必须主动请出它最危险的邻居，并证明自己在它们的覆盖之外切出了一个真实的辨别面。

对于本文试图指认的那个辨别面——当伴侣坠入意义框架坍塌的深渊时，以自身同样被破碎的生命经验为基底，悬置一切修复冲动，不携带任何神学结论，仅仅以在场的沉默承托对方——以下三位思想传统中的核心概念是其最直接的竞争者。

第一位是列维纳斯的“面容”伦理[3]（Levinas, 1961）。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的同一化暴力做了最为深刻的批判：当他者的面容在我面前显露其脆弱性与不可通约性时，我被召唤进入一种不将他者纳入任何既有认知-操作框架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他者，不再将他者收纳入我的意义系统，不再以一个解决方案去暴力地覆盖那个不可被覆盖的脆弱性。这确实切中了“悬置答案”“拒绝将对方标准化”的核心直觉。

但列维纳斯的共在有一道本体论上的不对称性：他者与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从根本上是不对等的。他者的面容向我发出永无止境的命令，而我——作为伦理主体——承担着一种无法转移的、无限的责任。列维纳斯的伦理战场，是“我”独自面对他者时的内在承担。

然而，本文所处理的情境，恰恰是在这道不对称性断裂之处开始的：在婚姻之中，当一方坠入深渊时，另一方很可能自己也正处于深渊之中——或者即使此刻不在深渊，她的信仰历史上携带着深渊的记忆，她也曾在那位沉默的上帝面前彻夜嘶吼过。此时，她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那个被面容发号施令的、居于安全地带的伦理主体；她自己就是一个幸存者。她对他者的承托，因此不是从“

我对他者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高度发出的，而是从“我也曾经在那里——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答案——所以我不会假装我有”的共同破碎之中发出的。

列维纳斯的“面容”伦理，因此无法覆盖“共在的深渊”所涉及的双重性——承托者与被承托者站在同一种不可知之中，面对的是同一位沉默的上帝。列维纳斯的不对称性在这里被一种特定的对称性所重新框定：不是“我有责任替你承担”，而是“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所以我不会给你假的答案”。这条辨别线，是列维纳斯与本文之间最清晰的分离点。

第二位是潘霍华的“沉默的团契”与“为他人存在”[4]（Bonhoeffer, 1951）。在被囚禁于泰格尔监狱的岁月中，潘霍华对那种“方法主义的敬虔”——一种将信仰拆解为可重复操作的方法与公式的宗教实践——做出了最为锐利的批判。在言语穷尽之处，潘霍华主张一种以纯粹“为他人存在”的形式呈现的信仰：不是去说对的话，而是去做对的人；不是去提供解释，而是去成为那个在黑暗中与对方同在的身体。

这听上去几乎就是本文的翻版。但仔细审视之下，潘霍华的沉默团契与本文的“共在的深渊”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在压力下会分离的差异。

潘霍华的“为他人存在”，其根基是对基督为他人存在的本体论参与。沉默，作为言语穷尽处的最后形态，在潘霍华那里仍然是一种因其指向基督而具备终极有效性的信仰行动——尽管它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方法”，却仍然被一个深厚的基督论承托着：基督曾在十字架上沉默，因此信徒的沉默是“与基督一同”的沉默。沉默，在这一结构中，并非意义的空缺，而是意义在另一种模态中的饱满——它是“话语的完成”，而非“话语的失败”。

然而，在本文所处理的极端情境中，深渊的形态恰恰是连那个基督论的承托都变得无法触碰。当康诺嘶吼“神到底在哪里”时，他所面对的，不是“我不知道此刻该怎么说”，而是“那个原本应该让一切沉默都具有意义的神圣叙事本身，已经被我的苦难撕碎了”。此时的沉默，不再是对基督沉默的参与，而是对基督沉默的困惑——它背后没有一个“因着基督所以这沉默是有效的”的承托。对康诺来说，如果那个“因着基督”仍然有效，他就不会嘶吼了。

这条分离线是关键：潘霍华的沉默团契，是一种仍有方向的沉默——它的方向是向着基督的参与。而“共在的深渊”所描述的那种沉默，是一种失去了方向的沉默——它没有指向任何神学结论，甚至没有指向那个“指向基督”的动作本身。它只是，仅仅是，在伴侣坠入那片没有任何叙事可以覆盖的黑暗时，留在那里。潘霍华的共在者仍然是一个信仰的见证者；而本文的“共在者”在那一刻，仅仅是一个破碎的、无能的、却拒绝离开的在场者。

这也划清了它同心理学“共情”与罗杰斯式“无条件积极关注”（Rogers, 1961）的关系。心理治疗的共情，预设了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角色不对等——被培训的一方为另一方提供专业的陪伴、倾听和不评判的容器。它无论如何深刻地运作，它最终是一段专业关系。在专业关系中，“以自身破碎

为基底”既不可能——治疗师不会向来访者袒露自己的深渊——也不被允许，因为它需要严格的专业边界保护来访者的安全。

而本文所处理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是一段盟约关系中的两个人，在共享的神圣意义框架发生内部坍塌的临界点上，彼此之间不再有专业角色的保护，也不再有“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对正确的夫妻”这个叙事的承托。她不是作为“受过训练的陪伴者”在陪伴他，而是作为和他一样活在一位沉默的上帝面前、也曾被那沉默像刀子一样划过的人，在陪他。这个差异——专业关系与盟约关系的本体论差异——使得心理学共情无法成为“共在的深渊”的1:1重述。

5.2 “共在的深渊”的命名

在与列维纳斯、潘霍华以及心理学共情传统的对质中，本文所追踪的那个辨别面终于可以被清晰地指认。

它不是列维纳斯式的伦理不对称性——因为承托者与被承托者面对的是同一位沉默的上帝，承托者自己也是深渊的幸存者。

它不是潘霍华式的那种仍然指向基督的、作为话语之完成的沉默——因为在这片深渊中，那个原本应该赋予沉默以意义的基督论框架，本身已经被苦难撕成了碎片。

它也不是心理治疗中的专业共情——因为在这里没有“治疗师/来访者”的角色墙，承托者与被承托者被同一份盟约、同一种沉默紧紧锁在一起，她的在场没有职业保护，只有赤裸的、不设防的共在。

本文将这种在特定条件下的伦理能力正式命名为：

共在的深渊——指涉的是婚姻关系中这样一种独特的能力与状态：当一方陷入无法被任何现有意义框架消解的存在性苦难时，另一方能够同时做到以下三件事：(1) 识别并悬置自己“提供解决方案”的本能冲动，承受“我不知道该如何帮你”的无能感；(2) 以自身同样面对过“不可知”的生命经验为基底，进入对方所处的无答案地带——这意味着她不是站在深渊边上向里面喊话，而是允许自己再度被那片黑暗触碰；(3) 在那片沉默中，完成一种不携带任何神学结论、不指向任何“应该”方向、不以恢复对方“正常属灵功能”为目标的单纯的在场。共在本身，就是全部。

它不是一件可以做的事。它是一种只能在某种特定的生命历练中被缓慢养成的能力——养成的关键，不是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而是在曾经身陷深渊的经验中，被迫体验过所有标准答案的苍白，从那以后便无法再以同样的笃定，向另一个人递出那些自己曾被其锋利边缘割过手的药方。

这个概念一旦成立，它的理论后果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婚姻的属灵质量，不能仅仅以“共负话语的密度”来衡量，而必须同时——在某些临界时刻，甚至是唯一地——以“共在沉默的承受力”来衡量。那个“承受力”，是指双方在面对某种双方都清楚已经无法被任何话语填满的沉默时，不逃离、

不粉饰、不递上假的光，仅仅允许彼此留在黑暗之中——而这本身，就是共负一轭最原初的形态。

六、当深渊开口：两个案例

一个只展示失败的理论，无法证明它所倡导的状态是可企及的。因此，本节提供双案例：一个展示了执行性信仰在深渊面前的结构性失效，另一个则展示了一种接近“共在的深渊”的回应如何在一个并非完美、却更为诚实的关系中被笨拙地活出来。两个案例均来自作者在华东某省会城市两间不同宗派传统的教会中进行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5]。所有姓名均为化名，辨识性细节已被调整。需要说明的是：第二个案例中的夫妻自身并不使用“共在的深渊”这一术语，他们仅仅是在一次危机中做出了一连串本能的回应——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对那些回应的后发命名，而非他们的自我描述[6]。

6.1 以琳与康诺：标准答案的裂缝

以琳和康诺结婚时，他们是被牧者和同辈视为“标杆”的一对。二人在同一间城市教会服侍，婚前完成了教会规定的全部辅导课程。他们的婚姻头五年，从外面看，是一个执行性信仰的典范运作。每天早餐后的共同灵修，每周一次因工作冲突而调整为视频通话的家庭祭坛，每月一次与另一对夫妻的“属灵伙伴”交通——每一项都有稳定的节奏，每一项都可以在需要时为那个“我们的婚姻是有根基的”提供可被查验的证据。

康诺在这五年中奋力经营一间创业公司。他是那种将“为神在职场作见证”作为人生核心叙事的信徒。生意好时，他在小组里分享“神的赐福”；生意差时，他宣布“这是神在操练我的信靠”。以琳则在这五年里学会了以恰到好处的经文和属灵话语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在康诺焦虑时提醒他“应当一无挂虑”，在他取得突破时回应“这是神为你开门”。两个人的话语系统，完美地咬合在一起。

然而，裂缝在第六年出现。康诺的公司在数月中遭遇接连重击，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被证明是错的。更致命的是，这数月中他每一天都在祷告，每一天都在宣告“神掌权”，每一天都在以小组所期待的“刚强壮胆”的面目出现在人前——但他的祷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所宣告的那位神，在这场漫长的溃败中持续沉默。

这个模式大约持续了四个月。康诺在这四个月里继续完成他的灵修清单——因为那清单是他唯一还能抓住的东西。以琳也继续完成她的那份——劝慰、代祷、引用经文、提醒他“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两个人在绩效层面仍然高度同步，但有一件事在以琳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生了：康诺的里面，有一根一直紧绷的弦，正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断裂。他不再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自己此刻需要听到的话——他需要听到的，是有人愿意诚实地对他说：“我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也很怕。”

这句话，以琳训练有素的属灵工具箱里没有。

断裂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深夜。康诺在独自祷告之后，从书桌前站起身，走到正在客厅看手机的以琳面前，以一种与他平日“属灵覆盖”截然不同的声音说：

“我祷告了几个月，神一个字都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在哪。我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以琳在那一瞬间感到了恐惧——不是为康诺的境况，而是为他所说的话。这些话不在婚前辅导的任何一章里。她默然了片刻，然后本能地启动了那个她最熟悉的程序：“我们要继续祷告。神不会离弃你。这是信心的试炼。”

康诺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向书房。以琳在那之后加倍了她的属灵争战——她联系了教会为康诺展开代祷链条，自己每天早上为他做属灵遮盖，并且在一次三人小组的交通中将康诺的状态表达为“他正在经历属灵的旷野，请你们为他守望”。在她那边，她正在做一切“正确”的事。在康诺那边，他在那个深夜起再也没有对她打开过自己里面正在持续坍塌的那个深渊。他们仍然一起祷告，仍然一起去教会，但在深渊的层面，他们之间的那扇门已经被永远地关上了。后来以琳在访谈中对我说过一句话：“那段时间我什么都做了。我就是没有坐下来，什么都不说，只是陪他坐着。”

这个故事揭示的，不是以琳这个人不够好。她尽了全力。她把她被教授的一切都做到了极致。这个故事揭示的是她所依赖的那套体系的边界：它告诉她在每一种情境下“应该做什么”，但它没有教她——当“做什么”本身成为深渊中那个人最承受不住的东西时，还能剩下什么。

6.2 文轩与书雅：另一种回应的笨拙生成

如果说以琳和康诺的故事展示了“共在的深渊”的缺失如何让一段婚姻在危机中空心化，那么文轩与书雅的故事则展示了它的另一种可能性——尽管他们自己从未用任何概念来命名它。本文在此引入这个案例，不是为了树立一个“正确”的范本——他们所做的远非完美，事后看来甚至有许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它只是一份田野记录，展示了一种在特定的生命经验中被破碎过、因而不再生迷信心话语的力量的人，在面对伴侣深渊时，可能做出怎样与此前体系训练出来的标准反应截然不同的回应。

文轩和书雅结婚十二年，同属一间改革宗背景的教会。文轩是中学教师，书雅在婚后辞去工作全职在家养育三个孩子。他们的婚姻前十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暗夜——书雅的母亲在她婚后的第三年因癌症去世，那场长达八个月的临终陪护过程，彻底击碎了她此前赖以运转的“神有美意”的叙事框架。她在那段日子里曾对着文轩嘶吼过、沉默过、在深夜独自坐在厨房地板上流过泪。文轩在那段日子里，起初也做过所有属灵丈夫被训练去做的事——他给书雅念经文，带她祷告，邀请教会长老来为她接手。有一天，书雅在他念完一段“万事都互相效力”之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几乎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说：“不要再对我念这些了。你念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你应该好起来。但是我现在好不起来。你能不能只是在这里，什么都不说。”

文轩后来在访谈中告诉我，那个瞬间改变了他此后对整个婚姻的理解。他当然没有从此变成一个完美的“深渊共在者”——在那个沉默里他感到极度不适，手心出汗，他不知道自己待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但就是从那个夜晚起，他开始学习一件事情：在某些时刻，面对书雅的痛苦，他能给的最诚实的回应，不是那个“最正确”的属灵答案，而是一句他当时脱口而出的、毫无灵修价值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没有走开。”

五年后，当文轩自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职业危机——他在一所基督教学校的教师职位因为学校财务问题被裁撤，同时伴随着一桩对他的教学能力的公开质疑——书雅是那个陪着他度过深渊的人。她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对他说过一句“神有预备”。不是因为她不相信神有预备——她仍然去教会，仍然祷告，仍然在那些词句中寻找她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是因为五年前她自己被那些标准答案割伤过，她记得那种痛，所以她无法用同一把刀去刺文轩。当文轩深夜独坐在书房，她所做的只是走过去，坐在地板上，背靠着他的书桌腿，没有开灯，没有出声。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那件事——没有把他正在经历的黑暗，翻译成一份需要被修复的属灵故障报告。后来文轩告诉我，他在那些深夜里，不知道书雅在想什么，他自己也依然无法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但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她也没有答案，但她没有走开”，这件事，成为他后来慢慢能够重新面对信仰的、唯一真实的起点。

需要在此格外审慎地避免一种误读：文轩和书雅的故事，绝不能被当作一个“模范样本”来替代以琳和康诺的“失败样本”。文轩和书雅的关系中同样存在大量未被解决的张力——书雅在与母亲去世相关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中，有过长期的对信仰的愤怒，那种愤怒至今没有完全消退；文轩在被裁撤之后的数月中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状，他几乎无法参与教会任何服侍。本文引入他们的故事，不是为了展示一种成功的“共在的深渊”技术，而是为了展示：当两个人都曾被深渊触碰过、体验过标准答案的无效性、因而对“用话语封堵裂缝”这件事产生了某种惯性的警觉时——那种笨拙的、绝非完美的、甚至看起来什么也没做的共在，是如何在那些特定的临界时刻，为那个坠入黑暗的人，留下一小块没有被虚假的光填满的空间。那块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承托。

七、回应三个最有力的反驳

7.1 仪式即同在？——涂尔干式的质疑

一个直指本文根基的反驳，来自涂尔干传统的仪式理论[7]（Durkheim, 1912）：共同的仪式和话语操练，本身就是在生产共享现实与集体情感。夫妻双方一同背诵经文、一同完成家庭祭坛、彼此使用同一套属灵词汇——这不正是“共在”的一种高度凝聚的形式吗？将其贬低为“绩效”，会不会遗漏了这种操练在实际经验中确实带来的联结感与短暂稳定？

这个反驳指出了一个本文必须严肃承认的事实：标准答案系统确实在许多日常情境中是有效的。它提供了共同语言，降低了沟通成本，为夫妻在一般的困难中提供了可依赖的结构。以琳和康诺婚

姻的头五年，正是靠这套结构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日常摩擦。本文从未意图否认这种有效性。

但本文所要分离出的，是一个涂尔干框架无法覆盖的特定压力点。仪式的效能，在其经典论述中有一个未被明言的前提：参与者仍然处在那套使仪式具有意义的神圣叙事之中。当他们一同背诵“万事都互相效力”时，这句经文真实性对他们二人而言尚未被根本地动摇。他们一同站在叙事内部，因此仪式加固的是他们在叙事内部的位置。

然而，当苦难的烈度越过某道看不见的边界——当康诺持续数月的祷告遭到沉默，当那句“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他口中变成了一句他每次说出都会在内心引发一阵冷笑的空壳——此时，他已经被逐出了那个让仪式有效的叙事空间。他不再站在叙事内部与她一起背诵；他站在叙事的废墟上，而她仍在叙事内部朝他背诵。此时的仪式，不是联结，是驱离。它不再是“我们”共享的集体表征，而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无意识的驱逐——她用那些词把他所身处的那个废墟，重新标记为“不正常的、需要被修复的异常地带”。

因此，仪式即同在的论述，在一个特定条件下遭遇了结构性失效：当一方已经不再以仪式所预设的方式居于那片叙事之中时，继续执行那个仪式，便会从一种共在的方式，逆转成为一种拒绝共在的方式。涂尔干的仪式理论无法涵盖这一特定的压力点，因为它从未处理过“信仰框架本身在内部坍塌”这一极端情境。

7.2 沉默的危险：临床边界的追问

第二个无法回避的反驳，来自临床心理学与危机干预的立场：对一个正处于严重抑郁、解离或具有自伤风险的配偶，采取“沉默的、不提供任何认知框架的共在”，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在某些临床情境下，一个需要被给予的恰恰是明确的认知框架和积极的干预——让大脑重新获得某种结构性的锚点，以防止进一步的坍塌。作者的“共在”是否承认这种临床边界？

这个质疑迫使本文做出一个必要的限定[8]——“共在的深渊”所指向的，从来不是一种放诸所有情境而无条件的普遍伦理。它有一个明确的适用范围。它并非针对那些需要临床干预的精神病理状态——面对一个正在经历精神病性抑郁、或处于急性自杀风险的配偶，沉默的无为可能构成失责。对于那些情境，存在一整套已经有充分实证支持的治疗性干预体系，本文的论述无意也无法替代它。

“共在的深渊”所适用的，是这样一个特定区间：对方的痛苦是真实的、正当的、且是深度存在性的——它根植于意义框架的坍塌、信仰叙事在面对具体苦难时的失效——而尚未进入需要临床危机干预的病理区。在这个区间里，对方的痛苦之所以在沟通中被持续复制、加重，往往不是因为它没有被干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被过度地、过早地、以标准答案的方式干预了。每一次“不要怕，神有美意”的递出，都在事实上告诉对方：“你不应该处于你此刻正在经历的存在性疑惑中。”而对方的真实经验是——他正在那里。这两者之间的裂缝，才是执行性信仰所制造的最深伤口。在那种情境下，“沉默的共在”不是替代治疗，而是对那一类特定暴力的终止。

并且，对于那个反驳中隐含的一个合理担忧——如何知道此刻是应该“沉默共在”还是应该“积极干预”？——本文无法提供一张操作清单，因为这张清单本身就是执行性信仰想要的东西。这一判断只能由那个具体的、活在那段关系中的人，在对伴侣的长期认知、对情境的敏感判断中，以全部的审慎去做出。这种不可被标准化的伦理判断本身，正是“共在的深渊”之所以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一种需要在生命经验中被反复磨砺的辨别力的原因。

7.3 存在主义的审美偏好？——方法论的自我审查

第三个反驳从方法论层面切入。它质疑：本文对“沉默”的推崇、对“深渊”的坚守，究竟是来自对经验材料的归纳，还是来自作者自身存在主义哲学偏好的投射？有没有一种可能——“沉默比话语更真实”——这个贯穿全文的判断，本身只是一个特定哲学传统的审美趣味被包装成了普遍伦理？

这是一个值得全文停下来认真面对的问题。诚实地说：本文的论述确实携带了一个未被完全论证的前提，即“在某种极端情境下，话语的增补会构成暴力的入侵，而沉默——恰恰因为它的空无——更可能成为真实的容器”。这个前提不能被视作自明的。它需要为自己做出论证。

本文在此提供如下辩护：这个前提，不是从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而是来自对执行性信仰系统在那些特定临界情境中的运作失效的观察。在以琳与康诺、以及文轩与书雅早年那场危机中，损害发生的具体机制可以被清晰地指认：它不是“话语太少了”，而是“话语被系统性地部署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那个位置，是把对方的深渊当成一个可以被正确的属灵语言覆盖掉的对象。当话语被部署在这个位置上时，无论它说得多么正确、多么合乎神学正统，它的功能都是封堵对方的表达，而非打开对话的空间。

因此，本文对沉默的推崇，并非源于一种浪漫主义的“话语是不真实的”的哲学先设。它源于一个更谦卑的经验归纳：在那些话语已经被滥用为封堵工具的具体情境中——在那里，每一次开口都被对方经验为一种新的暴力——沉默，作为一种话语的主动撤回，恰恰是唯一可能让真实重新进入的通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偏好；它是一个在具体失败中被逼出来的、操作层面的判断。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沉默本身就是解决方案。沉默可以是冰冷的，可以是惩罚性的，可以是防御性的退缩——这些问题完全存在。本文所谈的“共在的沉默”，与那些负面的沉默形态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在场的、已经将自己暴露给对方的、随时准备着重重新开口的沉默。它不是关闭，而是一种极度警觉的等待——等待对方发出信号，等待那个“现在可以说话了”的时刻，而不是由自己决定那个时刻应该何时到来。这种沉默，恰恰是不再把对方当成一个需要被自己的话语“修复”的对象。

八、不是培育——而是为另一种可能性留出空间

走到这里，本文已经完成了它的主要论证：撤销了一个底层先验，追踪了执行性信仰的生成路径，命名了一个不可还原的辨别面，展示了它在具体案例中的运作与缺失，并回应了三个最有力的反驳。接下来的问题——如果可以称之为“接下来的问题”——是任何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的理论都难以回避的：如果它指向的那个东西是真实的，那么它对教会的婚姻牧养实践意味着什么？

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显得令人失望地克制。因为对于一个从定义上拒绝被操作为技术的概念来说，“如何培育”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在犯下本文全程在批判的那个错误——它预设了存在一套可以被标准化的培育方案。

“共在的深渊”不可能被写成一套课程。这不是因为它太难了，而是因为只要它被写进课程，它就被执行性信仰重新消化了。你可以教一个人“当配偶痛苦时，不要马上祷告，先沉默几分钟”——但沉默一旦作为一项“正确技术”被教给学员，沉默本身就是下一步需要被执行的绩效指标。“不要说话”变成了另一种“正确的事要去完成”，于是沉默被收编为执行性信仰的最新型号。那道裂缝再次被缝合，执行性信仰对自己的反身吸收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这是否意味着一切实践指引都不可能？不。本文的立场是：不提供关于做什么的指引，而提供关于什么可能正在被系统性地排除的警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

第一个警示，是关于婚前辅导与婚姻课程的语言结构。任何一份辅导材料，如果从头到尾只包含“当X发生时，你们应当Y”的标准句式，而从未出现“在有些情境下，没有任何‘应当’”这一句——它就已经在结构上预售了一种不完整的属灵人类学。它告诉准夫妻如何在每一个可预见的困境中做对的事，却从未告诉他们：在那些所有“对的事”都失效的临界点上，你们彼此之间还能剩下什么。修改一份辅导材料，不一定意味着往里面加新的建议。有时候，更有意义的动作，是往里面加一段沉默——在那段文字中，课程承认自己的边界，承认在此之外有着它所无法覆盖的黑暗，并且鼓励夫妻双方那些黑暗真正降临时，允许自己不再依赖这份手册的权威。

第二个警示，是关于教会共同体对“属灵低谷”的默认回应。在以琳和康诺的故事中，当康诺的深渊通过小组的“代祷请求”被公开时，共同体所做的不是在深渊中与他一同沉默，而是迅速启动了一套高效的意义覆盖程序——代祷链条、属灵遮盖、旷野叙事。每一件都是出于善意，但合在一起，便把康诺的深渊从一桩值得被认真凝视的痛苦，重新处理成一桩可以被属灵技术修复的“灵性故障”。共同体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时刻，对一个破碎的人说——“我们不知道该为你祷告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我们在这里，没有走开”？那将是对整套属灵绩效文化最根本性的松动。

第三个警示，是给那些正在婚姻中独自面对深渊的人——无论你是康诺还是以琳，是文轩还是书雅。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在黑暗中嘶吼却只收到标准答案的人：你的嘶吼不是你对信仰的失败。它可能是你这段信仰历程中，第一次真正诚实的信仰行动。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那个拼命递答

案却感到对方越来越远的人：你所恐惧的，或许不是对方正在经历的黑暗，而是你自己在面对那片黑暗时的彻底无能。承认那份无能——对自己，对对方——可能是比递出任何答案都要真实的爱的起点。

九、结论：并无答案，但可能有一双手

本文的论证，走完了它必须走的一段路。它不是一篇提出“解决方案”的论文。它是一篇试图标记出“问题本身可能被提错了”的论文。

它从一道被磨损的界线开始，识别出一个从未被主题化的先验——在深渊面前，“执行”优先于“共在”。它追踪了这个先验如何在福音派的双重焦虑、教会增长运动与管理技术的合流、以及婚前辅导的制度化中，被逐步锻造为一整套本文命名为“执行性信仰”的互动逻辑。它解剖了这套逻辑的三重机制：标准答案的预植入、双人复核的常态化、深渊体验的预排除。在与列维纳斯、潘霍华以及心理学共情传统的二阶碰撞中，它指认了那个被这套逻辑遮蔽、却无法被任何既有概念覆盖的辨别面，并将其命名为“共在的深渊”。通过两份田野案例，它展示了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伦理能力的缺失如何导致婚姻的空心化，也展示了它在两个同样破碎的人身上笨拙显形的可能性。最后，它正面回应了仪式理论、临床边界与哲学偏好的质疑，并以一系列警示取代了“如何培育”的急切追问。

这一切论证如果有一个最终的凝聚点，它应该是这样一句话：婚姻最深的承托，不在于你们共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当其中一个人再也无法相信时，另一个人仍然选择留在那里。

在那些标准答案沉默的边界上，剩下的不是一套更好的答案，而是一个人——一个同样在黑暗中没有地图、却拒绝独自离开的人。那个人给不了光，但那个人的手臂是一种比光更古老的承托。

本文的论点——如果它的确是一个可以被反驳的论点——自始至终携带着一个明确的证伪条件。有什么新的事实如果出现，能从根本上动摇“共在的深渊”的立论？如果我们对被判定为“空心”的执行性信仰婚姻进行长时段追踪，结果发现在经历丧子、绝症、信仰幻灭等深渊性冲击之后，那些掌握了高度默契的属灵标准话语系统、在共同体中拥有密集意义支撑网络的夫妻，其婚姻韧性、伴侣心理健康水平与长期存在意义的恢复程度，反而系统性高于那些在各自怀疑中挣扎、彼此不给予标准答案、也不拥有绩效系统的夫妻——那么，“共在的深渊”便可能只是一个被存在主义审美过度包装的动人虚构。它可能高估了一种无法被操作的、脆弱的沉默共在的力量，却严重低估了那些看起来机械、廉价、却在危机中提供即时意义锚定与共同体支撑的标准答案系统在真实世界中的存活效能。要证伪它，不需要一篇反驳论文。只需要时间——以及在深渊面前，两条不同路径的婚姻所留下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真实存活记录。那记录本身，将是对这一判断最终的回应。

注释

[1] 本文所引圣经经文，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哥林多后书》6:14）、“万事都互相效力”（《罗马书》8:28）、“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参《诗篇》22:1）等，均作为基督宗教社群内部话语的一部分使用，其出处不再在正文中一一标注，亦不列入参考文献。约伯记与传道书的相关暗示亦然。

[2] 本文对20世纪中后期福音派焦虑、教会增长运动及管理技术转译的叙述，是基于该领域的常识性历史认知，并非针对特定实证研究的引证。此处不提供具体文献。

[3] 列维纳斯“面容”伦理的系统阐述，主要见其《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Totalité et Infini: essai sur l'extériorité*, 1961）。本文在借用此概念时，同时指出其在婚姻共在情境中的不对称性局限，并由此分离出本文的特定问题域。

[4] 潘霍华关于“沉默的团契”与“为他人存在”的思考，主要见于其《团契生活》（*Gemeinsames Leben*, 1939）与《狱中书简》（*Widerstand und Ergebung*, 1951）。本文的对话主要针对后者，并尝试在基督论框架暂时失效的极端情境中，重审沉默的性质。

[5] 本文两个案例基于作者于2019—2021年间在华东某省会城市两间不同宗派传统教会进行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所有姓名均为化名，辨识性细节已做调整。案例中的对话与情境经匿名化、合成与简化处理，属思想拓展性质的例示，并非经过同行评议的实证数据。特此说明。

[6] 文轩与书雅的回答是自发、本能的，他们自身未使用“共在的深渊”或类似概念。本文的分析是对其行为的后发命名，旨在提取一种伦理逻辑，而非声称他们有意实践此概念。

[7] 涂尔干的仪式理论，主要见于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1912）。本文所指出的失效情境，并不构成对涂尔干框架的整体否定，而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信仰叙事内部坍塌）下的补充与限定。

[8] 本文所论“沉默的共在”，严格限定于存在性苦难的区间，并不涵盖需要精神科或危机干预专业介入的临床情境。对于后者，沉默的无为可能构成失责，积极干预是必要的。本文的沉默主张，特指在标准答案话语已对受苦者构成二次伤害的场合，对话语暴力的主动终止；它始终以在场、警觉和随时预备重新开口为前提，与冷漠、退缩或惩罚性沉默有根本区别。

参考文献

- Bonhoeffer, D. (1951).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Durkheim, É. (1912).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vinas, E. (1961). *Totalité et Infini*.
Rogers, C.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